

## 二语产出的目的语化问题初探\*

邢红兵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

---

**提 要** 本文采用基于用法的二语习得理论,从目的语参照的角度,将二语产出按照和目的语的匹配程度分为表达错误、表达偏误、表达不地道和表达地道四个层次。本文认为,二语产出的过程是一个产出知识逐渐向目的语靠近的过程,本文将这个过程定义为二语产出的目的语化过程,目的语化过程中最终的评价标准就是地道性。

**关键词** 二语产出 目的语化 地道性

---

### 一、引言

人类大脑对语言的认知加工过程中存在着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两个不同的认知过程(舒华等,2003),这两个过程无论是在母语加工还是在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以下简称“二语”)加工过程中都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在二语学习者的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理解目的语(target language)和利用目的语进行表达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心理过程,从心理词典的构造来看,这两个过程对应的是二语学习者语言输入和语言产出的心理过程。研究者已经构造了不同的二语产出的模型,比如Levelt(1989,1995,1999)最早提出的语言产出模型,该模型将概念系统与语言系统分开。De Bot(1992)在此模型基础上提出了双语产出模型(bilingual production model),认为双语产出模型与单语产出模型没有本质的区别,双语产出是依靠不同的子系统的,人们使用该系统时总是只使用其中一种语言,该模型设立了两个话语形成器,对应于两个词库,每一个形成器都包含两种语言专用的形态句法信息。Green(1998)的激活/抑制模型(activation/inhibition model)描述了完整的二语加工过程,该模型将控制机制引入二语产出模型。Kormos(2006)也提出一种二语产出模型,强调了语言的记忆和加工系统,特别提出了二语加工过程与母语加工存在不同。这些模型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具备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探讨二语产出的能力及其评价标准作为模型的重要特征。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关注二语的产出特点,并从二语产出的语言特征、交际内容、交际功能和目的语相似性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是,随着基于用法(usage-based approaches,UB)的二语习得理论的逐步发展和

---

\* 本文受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6PT01)的资助。

习得研究的逐步深入 (Tomasello, 2003; Wulff, 2008; Goldberg, 2009; Ellis & Wulff, 2015), 中介语对比分析方法的推广和应用 (Granger, 1998, 2002, 2015), 研究者逐渐意识到, 二语能力特别是产出能力和目的语的关系非常密切, 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目的语特征的作用。邢红兵 (2009, 2016) 认为, 二语学习不同于母语学习, 二语习得的过程更加注重意义的表达在目的语语言体系中的实现, 这就决定了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目的语知识体系是二语产出的重要依据。因此, 本文将从二语与目的语匹配的角度讨论二语产出的目的语化过程, 重点讨论目的语化过程中二语表达是否地道的问题。

## 二、对二语产出的评价

### 2.1 基于语言特征的评价

基于语言特征分析进行二语产出评价是目前研究者最为关注的, 研究者普遍采用的维度是二语产出的复杂性 (complexity)、准确性 (accuracy) 和流利性 (fluency) (简称 CAF), 这三个维度的提出是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二语教学相关研究。Brumfit (1984) 最先提出二语口语产出的二维特征为流利 (fluent) 和准确 (accurate), Hammerly (1991) 在上述特点的基础上增加了复杂性 (complexity) 维度, 此后逐渐形成了目前广泛使用的口语产出的三个维度。Skehan (1996) 提出了一个新的语言能力模型, 将复杂性、准确性和流利性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Larsen-Freeman (2009) 以复杂理论为基础, 为复杂性、准确性、流利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泛的框架。目前研究者对二语产出的评价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 还有研究者对二语学习者的 CAF 动态发展进行了考察 (李茶、隋铭才, 2017)。有研究者专门对二语产出的流利性进行了研究 (张文忠, 1999; 郭修敏, 2007), 也有研究者对二语产出的复杂度进行了研究 (易保树、罗少茜, 2012)。<sup>①</sup> 研究者还对汉语作为二语的产出能力评价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郭修敏, 2007; 陈默, 2015; 王希竹, 2018)。有研究者提出了认知流利性和表达流利性 (Segalowitz, 2000), 并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对二语的认知流利性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胡伟杰, 2018)。陈默 (2015) 的研究还发现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吴继峰等 (2019) 以语言特征和内容质量为测量维度, 对汉语二语产出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 复杂性和流利性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自身的外在特征的评价方式, 并不是二语学习者语言产出的内在机制的直接指标。流利性主要作为二语的口语产出的评价指标, 不能完全代表二语产出评价研究, 尤其是对书面语的评价能力有限。准确性和中介语理论的偏误分析关系密切, 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突破偏误分析的局限, 对于二语产出是否正确, 目前主要的手段还是基于母语者的主观判断。而二语学习者的目的语产出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往往不能只是用“对”与“错”来进行简单的评判, 需要通过更精确的参数来描述, 而且这个描述指标的制定一定要基于对产出的语言的特征与目的语的匹配程度的考察。

### 2.2 基于交际功能的评价

也有研究者采用交际能力标准作为重要的指标。Bachman (1990) 提出语言交际能力的概念, 认为语言交际能力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 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从二语的口语产出评价角

<sup>①</sup> 不同作者在用字上存在差别 (“度” / “性”), 我们在引述时采用的是作者原文中的说法。

度来看,交际语言能力理论(Bachman, 1990; 杨惠中, 1999; Luoma, 2004)认为,口语能力通常包括语言要素的运用能力、话语组织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等方面,无论是哪种能力的获得,都离不开目的语的参照作用。Pallotti(2009)批评CAF与交际能力的不对应性,强调话语功能性的重要作用,认为如果仅从纯粹的语言学角度衡量一段口语产出,而不重视口语产出的话语功能性的话,那么基于任务的口语产出研究是不完整的。杨惠中等(2011)曾指出,“语言使用的准确性和丰富性”与“口语交际的有效性”是口语能力构成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强调了语言属性和交际作用两个方面。刘春艳(2015)考察了构成口语产出复杂性、准确性及流利性的言语特征量与口语产出的交际充分性之间的预测关系,认为表达流利、用词准确以及在言语细节上给听话人制造的好印象对口语产出的交际充分性的实现有促进作用。阳捷(2018)认为语用失误与语境维度在语言产出质量的评价方面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简称SFL)是以交际能力理论为基础的,重视培养外语学习者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进行交流的能力(韩宝成、常海潮, 2011)。大家熟悉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简称CEFR)的运用能力(can-do statement)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功能的语言评价。王佳旻(2012)同样采用交际能力为主的方法制定了二语的能力标准的描写框架,并指导完成了汉语作为二语的能力标准的等级描述。总体来看,用交际能力来评价语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仅仅基于语言特征对语言能力进行评价的局限。

### 2.3 基于目的语标准的评价

随着基于用法的二语习得理论和联结主义模式在语言习得研究中的逐步推广和应用,目前对于二语产出的评价也逐渐转向与学习者的目的语的实际使用特点结合起来,特别是随着中介语对比分析方法的应用,研究者们已经逐渐关注到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属性在二语能力评价中的作用,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Wolfe-Quintero et al.(1998)将准确性定义为二语知识与目标语言规范的符合性, Housen & Kuiken(2009)将准确性定义为二语性能偏离规范的程度。基于用法(usage-based)的语言习得理论强调语言中概念和符号的相关性(Tomasello, 2003; Wulff, 2008; Goldberg, 2009)。Wulff(2008)指出,我们的语言大多数情况下是程式化的(formulaic),我们的大脑通过收集大量真实语言的用例,从语言使用中提取知识。Goldberg(2009)认为,基于用法的习得过程研究强调形式和意义的关联,基于用法的方法假定所有的语言知识都是在输入的基础上构建的。Ellis & Wulff(2015)认为,语言学习是对形式和意义、功能配对关系的学习,语言学习本质上是基于范例的学习过程,语言学习是一种对语言的认知逐步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复杂的和自适应的系统,语言学习是人脑的认知机制(cognitive mechanism)与输入的交互作用。Granger(1998, 2002, 2015)提出了中介语对比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通过语料库的方法,对比中介语和目的语的差异,对比的关键是目的语对中介语的参照作用。赵金铭(2002)已经注意到目的语合法性在二语句法结构中的作用,从句法结构规则的角度将二语产出划分为“汉语中正确的句子、造得不好的句子、符合语法的不正确的句子、不符合语法的句子、汉语中不可能出现的句子”五个等级。姜孟、王德春(2006)提出了“显性不地道现象”和“隐性不地道现象”,认为处于“词汇联想”和“母语概念中介”阶段的学习者可能出现“显性不地道现象”,而处于“外语概念自主阶段”的学习者则会出现“隐性不地道现象”。有学者认为,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能产出与母语者没有差别或基本类似的表达形式是大多数外语学习者的终极目标,并从隐性不地道角度进行了研

究(姜孟, 2006; 刘露, 2014; 姜孟、周清, 2015), 甚至进行了 ERP 及相关研究(姜孟等, 2016)。刘春艳(2015)在定义流利度的时候, 认为流利度重点表现在说话人处理停顿、犹豫和重复时与母语者产出模式的接近程度。从这些研究来看,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二语产出采用目的语标准的重要性, 也已经从不同角度关注过这类问题, 比如提出二语产出的正确性(accuracy)、地道性(idiomacity)、得体性(appropriacy)、自然性(naturalness)等概念, 但是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层次, 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我们认为, 衡量二语产出最重要的标准是二语学习者的目的语知识体系的构建程度, 而构建二语知识体系的信息输入来源就是目的语本身, 表现在二语产出能力方面, 重要的指标就是表达形式(语言的产出形式, 包括口语产出形式和书面语产出形式)与目的语的一致性问题。

### 三、二语产出的目的语化过程

#### 3.1 二语产出能力是逐渐形成的

本文界定的二语产出能力并不完全等同于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体系, 即通常所说中介语系统, 我们所说的二语产出能力是能够产出从根本上拉近与目的语的表达形式距离的能力, 其核心是构建一个完全独立的目的语的知识体系。二语产出能力是逐步形成的, 这种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于学习者的母语的知识体系, 在自己的母语的体系上逐步构建目的语知识体系, 逐步形成独立的二语知识体系, 以逐步支撑其二语产出能力。这个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建立目的语概念和符号联结体系。这个过程是二语学习者把心理词典中的概念体系与目的语的符号体系(包括语音系统和书写系统)建立联结。(2) 建立目的语的规则体系。目的语的构造体系包括正字法规则、词法规则、句法规则、频率特征等。(3) 建立一套目的语可接受的表达体系。这个体系实际上是来源于对目的语知识的综合, 是二语产出最为核心的内容。这部分知识涉及的内容很多, 比如语言单位的频率特征、语言的功能差异、语体差异、语言的常用性及母语者的可接受程度等来源于目的语母语者的使用规律, 这些规律并不能直接提取, 而是要通过对语言的实际使用来获得。对二语学习者来说, 目的语符号的选择及规则的获得是基础知识, 比较困难的阶段是产出符合目的语规则的表达形式, 二语表达需要二语学习者在二语表达的过程中选择一种既要符合二语的构造规则, 也要符合二语表达习惯的表达形式。

#### 3.2 二语产出的关键是二语知识体系的构建

二语学习者的目的语知识体系的逐步形成是二语习得的重要目标, 也是成功习得二语的关键。我们以词汇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例, 根据邢红兵(2009, 2016)的研究, 词汇知识体系的构建是词汇特征的逐步形成及其联结关系的不断调整过程, 这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就是二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体系逐步向目的语词汇知识体系接近的过程, 这个过程受到学习者母语的影响, 也受到目的语的影响, 但是二语学习者最终需要建立一个近似于目的语的二语词汇知识体系。其中搭配知识的构建是词汇知识体系构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邢红兵, 2013; 李梅秀, 2018)。比如要表达“讲故事”这个概念, 我们就必须具备基于搭配知识体系的词汇搭配知识体系, 在表达这个概念时可选的动词有“讲”“说”“告诉”等, 在判断它们能否和“故事”形成搭配时, 不仅需要句法知识, 还需要了解表达习惯。汉语母语者一般不说“说故事”“告诉故事”, 只说“讲故事”, 因此“讲”和“故事”的搭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故事”就成为动词“讲”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特征, 同

样,“讲”也成为“故事”的重要语义特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体系。再比如,就动词来说,词汇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包括动词的框架类型及其频率属性等特征的形成(赵奕,2013;石高峰,2018)。我们认为目的语知识体系就是来源于目的语体系中的规则性、动态性等知识的综合。

### 3.3 二语产出的目标是与目的语相匹配

我们认为,评价二语知识体系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将目的语的使用情况作为参照,即二语学习者的目的语表达是否能够被目的语母语者接受。二语学习者二语产出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二语学习者在表达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及语言表达形式与目的语使用之间的匹配(matching)程度。二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进行表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其语言表达对于母语者的可接受程度。因此,二语产出能力的形成是一个由学习者母语为语义体系和用法基础的母语知识体系作为表达支撑的模式逐步向符合目的语的语义体系和用法基础的目的语的表达模式转换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叫作二语表达的目的语化过程(native-like attainment)。在这个过程中,二语知识体系逐步向目的语知识体系靠近,表现在二语产出的目的语化过程中,即为二语产出与目的语的匹配程度越来越高,逐渐接近目的语的表达形式,同时二语学习者逐步摆脱对母语知识体系的依赖,逐步建立起接近目的语的知识体系。由于目的语知识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目的语化过程也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因此,中介语实际上就是目的语化过程中不同阶段二语产出的表现。

## 四、二语产出与目的语的匹配程度

我们将二语学习者二语产出的目的语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为四个不同层次:错误、偏误、不地道、地道。

### 4.1 产出没有受到目的语规则的制约

第一个层次是二语产出过程中出现的产出错误,一部分是学习者在表达过程中产出完全不符合目的语的构造规则的语言单位,比如产出的词语不符合目的语的构词规则,或者是产出的语言单位不符合目的语的组合规则,比如产出不符合汉语特点的搭配。从匹配程度来看,这类错误完全不符合目的语的表达。错误的表达形式可能是由于学习者受到母语影响而产生的跟目的语无关的表达形式,也可能是由于学习者还没有获得目的语规则而产生的完全错误的表达形式。下面举例分析(本文的例句均来自“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参见储诚志、陈小荷,1993)。

(1)\* 他们拿走李刚的照相机也看他的认出卡。

(2)\* 妈妈,中国人是很好。

(3)\* 我来了北京和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别的美国男人。

例(1)中的“认出卡”实际上是学习者对母语词(英语的 identification card)的直接翻译,在构词上没有受到目的语的影响。例(2)中的“是”是由于学习者将英语系词的句法规则迁移到了目的语中。例(3)也是学习者按照英语句法的结构模式直接生成的汉语句子,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二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绝对错误是比较少见的,这些错误常常出现在学习的早期。

## 4.2 产出目的语规则化的偏误表达

这个层次是二语产出过程中的偏误。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二语学习者的产出符合目的语的构造规则，但在目的语中不被接受。这类情况是由于学习者将目的语规则过度泛化造成的产出偏误，是中介语系统中研究者关注比较多的问题，偏误分析也是中介语研究的主要手段。比如：

- (4)\* 好像在看一部慢形电影一样，都不要错过这美好时光。  
 (5)\* 我希望我将要找到心脏病治疗的一种新好的方法。  
 (6)\* 我一定不要坐失良机，所以我们两个约定下天在我的房间会面。

上述例句中的“慢形”“新好”“下天”都是学生构造的词语，符合汉语的构词方式，但是是偏误词，因为在目的语中不能使用。再比如：

- (7)? 我们该互相帮。  
 (8)? 以后他的工作完的时候，他们结婚日期达到了。  
 (9)? 我现在在中国学习，所以这个新年我过在离我家很远的地方。

例(7)的“互相”用于书面语，而“帮”是口语色彩比较浓的词，两者之间的配合就存在语体风格不匹配的情况。例(8)的“日期”口语特征明显，而“达到”则是书面语色彩浓一些，汉语母语者很少将两者进行搭配，因此这属于搭配偏误。例(9)的“在离我家很远的地方”不适合用在动词“过”的后面，但是汉语动词后接由“在”构成的介词结构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 4.3 产出不地道的目的语表达形式

这个层次是指二语学习者产出目的语母语者不能接受的表达形式，就是说按照目的语的句法、语义、语用等语言学规则，学习者的表达形式符合汉语的构造规则，是汉语中正确使用的表达形式，但是在表达学习者想要表达的意义时，母语者一般不采用这样的表达形式，这就是二语产出中的地道性问题。地道性问题实际上是二语产出过程中目的语表达形式在目的语系统中适应性的选择过程。例如：

- (10)? 中国有许多跟我国家的习惯很不一样的习惯。  
 (11)? 他为了工作来北京。  
 (12)? 来中国以后，我很长时间住在大使馆。  
 (13)? 我来中国以前，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  
 (14)? 比起新西兰来中国有的是人!  
 (15)? 我很喜欢联系别人。

例(10)~(15)在词语选择和句法结构等语言特征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让汉语母语者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可能就不会这样表达。对于例(10)，母语者可能会说“中国有许多习惯跟我们国家很不一样”。对于例(11)，母语者可能会说“他来北京是为了找份工作”。例(12)这句话母语者会说“来中国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大使馆住的”。例(12)强调的是住的位置，而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是没有其他地方住，因此强调的是住的方式，用“是在大使馆住的”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例(13)是描述一个状态，没有任何主观性，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并不需要使用“连”字句，更好的表达形式是“我来中国以前，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例(14)“中国有的是人”用在这里显然不地道，作者想表达的是“和新西兰相比，中国人口很多”。例(15)作者实际想表达的意思在汉语中更适合用“我很喜欢跟别人交往”来表达。汉语中“联系别

人”不是常用的搭配,但二者是可搭配的,而“跟别人联系”或“跟别人交往”是地道的汉语表达形式。

#### 4.4 产出地道的目的语表达形式

这个层次是指二语学习者能够产出地道的目的语表达形式。二语产出地道是指二语学习者产出的表达形式完全符合目的语的使用习惯,包括能够根据表达需要选择目的语的语言形式,具备丰富的目的语知识体系,能够合理使用言外之意,具备目的语的使用风格,等等。比如例(16)和(17)也来自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16)最近我父母要回国,所以我搬到公寓楼住,我自然有了一个同屋,她是第一个进入我个人生活的外国同学。

(17)唐宋时代、从日本来华的留学僧很多,他们学习后,将中国菜和饮茶文化带回了日本。日本“茶祖”荣西禅师他也两次到中国来留学。

这类句子应该是最为接近目的语汉语的表达形式,我们认为,这样的二语表达可以看成是地道性比较高的表达,也是二语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目标。

## 五、二语产出的地道性

### 5.1 地道是二语产出的最高层次

我们认为,地道是二语产出的最高层次。我们所说的地道性不包括错误和偏误,比如例(7)的“互相帮”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搭配偏误,汉语母语者对这个搭配的使用率几乎为零,它实际上是二语学习者根据规则产出的搭配,因此,这类问题是由于学习者将目的语规则过度泛化产生的偏误,不是地道性问题。而例(11)“他为了工作来北京”这句话没有汉字书写错误,没有构词方面的错误,句子结构也合法,符合汉语语法规则,但是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这说明地道性是在一般错误和偏误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才出现的问题,需要更多来自目的语的使用角度的标准来验证。因此,地道性实际上是学习者将目的语的输入信息内化为语言知识体系的过程,是一个内在规则和使用率共同作用机制的形成过程,只有二语知识体系达到接近母语者知识体系的程度,学习者的二语产出才能达到比较高的地道性。总之,判断二语产出能力的最重要标准就是二语学习者是否构建了一个接近目的语母语者的语言知识体系,表现为产出的语言表达是否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我们把二语学习者产出的语言形式和目的语的语言形式存在较高的匹配程度叫作地道。

### 5.2 地道是对目的语表达的选择

地道本质上就是对于目的语不同表达形式的选择使用问题,地道的标准就是选择母语者更能接受的表达形式。比如,对于汉语母语者来说,“作业做完了”和“做完作业了”都是正确的表达形式,我们看例(18)和(19)(来自百度搜索):

(18)一天,我做完作业正要出去玩时,爸爸问:“作业检查了吗?”

(19)听说,快开学了,作业做完了吗?

例(18)“我做完作业正要出去玩时”改为“我作业做完正要出去玩时”就不地道了。例(19)“作业做完了”若改为“做完作业了”也不符合汉语的话题句强调焦点“作业”的特点。因此,母语者实际上也存在对不同表达形式进行选择的过程。再比如汉语中表达“不吃米饭”这个概念时,我们可以有“不想吃米

饭”“不要吃米饭”“不吃米饭了”“不要米饭了”“米饭不要了”“米饭不吃了”等形式，但是每个句子都有各自的含义，“我吃饱了，不要吃米饭了”的表达形式就不如“我吃饱了，不吃米饭了”地道，这种对表达形式进行选择的过程涉及的就是地道的问题。

### 5.3 地道是可以量化计算的

对于表达形式是否地道，我们是可以进行量化研究的，量化的标准就是表达过程中各种语言单位和目的语的匹配程度。匹配的程度可以通过词汇、句法、可接受度等参数来评价，我们把对地道进行量化的表示叫作地道性（nativeness）。例如：

(20) 这个时候有长途电话从无锡打来。

(21) ? 学习汉语很有意思，尤其我们班老师比别的班的更努力地给我们讲。

(22) ? 路一般是窄的，有一些街是很宽的，所以大家喜欢用那些街。

例(20)~(22)三个句子都是不地道的句子，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句子在地道性方面的得分是不一样的，相比之下，例(20)更加地道，只需要在“有”后面加上“个”就可以了。而例(21)的后半句最好改为“尤其我们班的老师比别的班的老师讲课更努力”，地道性显然要比例(20)低很多。例(22)的地道性就更低了，应该改为“街道一般很窄，有一些比较宽的街道，大家喜欢在这些街道上活动”。当然，地道性如何量化，这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寻找更加有效的评价指标，然后进行量化分析。

## 六、结论

本文从二语产出的评价角度入手，对二语产出的目的语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二语学习者的二语产出能力是其语言能力最重要的体现，是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核心。二语产出能力是逐渐发展的，其发展的目标就是逐渐接近目的语的表达形式，我们将由中介语体系向目的语体系逐渐转变的过程称为目的语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产出与目的语的表达形式相匹配，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是衡量二语产出的最高标准，而考察这个变化过程的最重要的参数就是二语表达是否地道。我们认为，地道性是二语学习者最难获得的，也是考察二语学习者表达能力的关键。从二语产出的内在机制以及二语与目的语的关系来看，我们认为二语产出与目的语的匹配度是二语产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因为符合目的语使用习惯的、地道的二语产出才是二语表达的最终目标。地道性可以从语言单位、语言结构、语言单位及结构的使用等角度来考察，还需要从语言功能角度考察，更重要的是从二语学习者心理词典中内在语言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的角度考察语言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此外，地道性还需要进行量化研究。影响二语产出地道性的因素很多，涉及汉字、词汇、句法、语用、功能等不同知识体系以及不同类型的联结关系，因此，对于地道性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 陈默.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自然口语产出的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研究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5 (3): 1-10.
- 储诚志, 陈小荷. 建立“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的基本设想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3 (3): 199-205.
- 郭修敏.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量化测评 [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4): 91-94.
- 韩宝成, 常海潮. 中外外语能力标准对比研究 [J]. 中国外语, 2011 (4): 39-46.

- 胡伟杰. 基于认知加工的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测量[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2): 241-252.
- 姜孟. 外语学习者在外语使用中的隐性不地道现象——基于中国英语专业学生的实证研究[J]. 现代外语, 2006(1): 44-53.
- 姜孟, 高梦婷, 蒲莹晖, 等. 语言概念能力框架下外语学习者“隐性不地道现象”的 ERPs 研究[J]. 外国语文, 2016(6): 75-88.
- 姜孟, 王德春. 外语思维再思考——论外语思维的“概念化模式”内涵[J]. 外语研究, 2006(4): 38-44.
- 姜孟, 周清. 语言概念能力假设与外语学习者的“隐性不地道现象”[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4): 43-49.
- 李茶, 隋铭才. 基于复杂理论的英语学习者口语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发展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3): 392-404.
- 李梅秀. 基于搭配知识体系的汉语二语搭配习得机制研究[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18.
- 刘春艳. 汉语学习者任务型口语产出中复杂性、准确性及流利性与交际充分性的关系研究[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15.
- 刘露. 外语学习者二语产出的隐性不地道现象成因探析[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4(11): 138-139.
- 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M]. 刘骏, 傅荣, 主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石高峰. 汉语动词句法框架信息及加工机制研究[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18.
- 舒华, 柏晓利, 韩在柱, 等. 词汇表征和加工理论及其认知神经心理学证据[J]. 应用心理学, 2003(2): 41-45.
- 王佶旻. 制定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能力标准的初步构想[J]. 语言文字应用, 2012(1): 109-116.
- 王希竹.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口语产出流利度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 吴继峰, 周蔚, 卢达威. 韩语母语者汉语二语写作质量评估研究——以语言特征和内容质量为测量维度[J]. 世界汉语教学, 2019(1): 130-144.
- 邢红兵. 基于联结主义理论的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框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9(5): 66-73.
- 邢红兵. 词语搭配知识与二语词汇习得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4): 117-126.
- 邢红兵.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词汇习得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阳捷. 语用失误及语境缺席——二语写作评价需要重新考量的维度[J]. 戏剧之家, 2018(31): 214-215.
- 杨惠中. 大学英语口语考试设计原则[J]. 外语界, 1999(3): 48-57.
- 杨惠中, 朱正才, 方绪军. 英语口语能力描述语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级划分——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证研究[J]. 现代外语, 2011(2): 151-161.
- 易保树, 罗少茜. 工作记忆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产出的流利度、准确度和复杂度的影响[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5): 43-47.
- 张文忠. 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发展的理论模式[J]. 现代外语, 1999(2): 205-217.
- 赵金铭. 外国人语法偏误句子的等级序列[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2(2): 1-9.
- 赵奕. 基于语料库的单一动词句法框架研究及二语习得考察[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13.
- BACHMAN L F.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BRUMFIT C J. *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 Roles of Fluency and Accura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E BOT K. A bilingual production model: Levelt's 'Speaking' model adapted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2(1): 1-24.
- ELLIS N C, Wulff 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ABROWSKA E, DIVJAK 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G].

- Berlin: DeGruyter Mouton, 2015. 409-431.
- GOLDBERG A E.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9 (1): 93-127.
- GRANGER S. The computerized learner corpus: a versatile new source of data for SLA research. In: GRANGER S. *Learner English on Computer* [G]. London: Longman, 1998. 3-18.
- GRANGER S. A bird's-eye view of learner corpus research. In: GRANGER S, HUNG J, PETCH-TYSON S. *Computer Learner Corpor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3-33.
- GRANGER S. 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 a reappraisa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er Corpus Research*, 2015 (1): 7-24.
- GREEN D W. Mental control of the bilingual lexico-semantic system [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998 (1): 67-81.
- HAMMERLY H. *Fluency and Accuracy: Toward Balance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
- HOUSEN A, KUIKEN F. Complexity, accuracy, and fluenc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9 (4): 461-473.
- KORMOS J. *Speech Produ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6.
- LARSEN-FREEMAN D. Adjusting expectations: the study of complexity, accuracy, and fluenc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9 (4): 579-589.
- LEVELT W J M.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 LEVELT W J M. The ability to speak: from intentions to spoken words [J]. *European Review*, 1995 (1): 13-23.
- LEVELT W J M. Models of word production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999 (6): 223-232.
- LUOMA S. *Assessing Speak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ALLOTTI G. CAF: defining, refining and differentiating constructs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9 (4): 590-601.
- SEGALOWITZ N. Automaticity and attentional skill in fluent performance. In: RIGGENBACH H. *Perspectives on Fluency* [G].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200-219.
- SKEHAN P. A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sk-based instruc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6 (1): 38-62.
- TOMASELLO M.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OLFE-QUINTERO K, INAGAKI S, KIM H Y.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Writing: Measures of Fluency, Accuracy, and Complexity* [R].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Center, 1998.
- WULFF S. *Rethin & Idiomaticity: A Usage-based Approach* [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Native-like Attainment of Second Language Production

XING Hongbing

###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sage-bas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study divides second language production into four levels according to what extent it matches the target language, which are wrong expression, erroneous expression,

unidiomatic expression and idiomatic express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produc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production is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target language, defined as the process of native-like attainment, and the ultimate rubric to evaluate what's achieved in this process is idiomaticity.

### Keywords

second language production; native-like attainment; idiomaticity

### 作者简介

邢红兵,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学习与认知研究。

---

(上接第 37 页)

## On “Chinese +” and “+ Chine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WU Yinghui, LIU Shuaiqi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hot topic “Chinese +” as well as “+ Chinese”, a term coined by the auth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Chinese +” requires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investment of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while “+ Chinese”, based on the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in different trades, regards Chinese language competence as an affixed ability that serves all walks of life.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 and “+ Chinese” lies in which of vocational skill and Chinese language competence is the affixed ability. Both “Chinese +” and “+ Chinese” will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romoting Chinese to the world. The concept and goal of “Chinese +” guide the dir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while “+ Chinese”, as a new concept and goal, is a way to realize “Chinese +”.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hould always focus on the main task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Keywords

Confucius Institutes; “Chinese +”; “+ Chinese”; localized development

### 作者简介

吴应辉,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教授, 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传播。

刘帅奇,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